

近代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

2019年10月21日（一）

一、前言

在這次講演，筆者想要論述包括筆者自身在內的、在近代日本（尤其是在近代東京大學）的中國哲學研究之誕生和歷史等諸問題。因為，筆者對於「中國哲學研究」中的「哲學」這個論點或做法很感興趣，所以，想要思考在近代日本的中國思想研究的傳統和新發展。

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文化（這並非經濟、軍事上的含義）水準處於停滯的、萎縮的、不健康的時期，那麼之前的文化構造就會像巨石一樣壓下來。有時這塊石頭會越來越重，甚至國民想在其重壓下稍稍喘息都變得十分困難。這樣一來，國民會秉持許多故步自封的舊有的觀念，難以從中掙脫，這意味著國民本身就變成了重石，甚至變成化石。相反，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文化處於前進的、成長的、健康的時代，那麼每次都會對之前的文化構造有飛快地突破。——我對貴國不久的將來有所期待，其理由正在於此。

明治維新（1868年—1912年）以來，日本對於中國思想、東方思想研究的發展歷程，如果集中於「哲學」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內涵、或者以「哲學」為切入口加以分析的話，概言之，可分為以下

四個時期或者類型。

二、明治維新政府對於「哲學」的移植

近代日本中國哲學研究的第一時期，開始於把「哲學」作為「philosophy」的譯語來加以使用的 1872 年乃至 1874 年以後。這個時期，學術界借助明治政府文明開化主義或西歐化政策的潮流，對從直到江戶時代（1603 年—1867 年）為止的儒學以及漢學中產生的中國思想研究展開了批判；「哲學」起著推動近代化或西歐化的作用。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 1881 年—1882 年的文教政策訂正之後，我將其結束期設定於 1895 年前後。

1872 年頒布的學制，是明治政府為了實行文明開化主義或西歐化政策而制定的。根據這一政策，江戶時代以來的藩學¹、私塾²、寺子屋³都被關閉了，漢文作為一個學科也被否定了，舊有的儒學、漢學幾乎陷入奄奄一息的地步。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的研究傳統，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形成的。

¹ 「藩學」是江戶時代的行政單位「藩」的公立學校，也叫「藩校」。老師是各藩的學者、儒者。學生是武士的子弟。教育內容以儒學為主，還有兵法，到了江戶晚期把洋學、醫學也教學過了。

² 「私塾」是著名的學者或儒者，比如本居宣長、吉田松蔭等開設的私立學校。有「漢學塾」「洋學塾」等。教育水平一般來講比較高級。

³ 「寺子屋」是私立的初等學校。老師是武士、醫生、和尚和神道的神官等，教育內容是讀書、識字和珠算等。學生是平民的子弟。

隨著 1877 年東京大學⁴的設立，文學部設置了「和漢文學科」。當時東京大學的總理（校長）加藤弘之（1836 年—1916 年）非常重視德國學，認為「和漢文學科」僅有和漢文，有失固陋之憂，就讓這一學科兼學英文、哲學、西方歷史，而且所有學科都用英文授課（直到 1883 年）。其結果是，直到 1885 年，這一專業僅畢業了 2 名學生。如果說這一時期的東大文學部還不具備培育中國思想近代式研究的環境，並不為過。

1881 年—1882 年，明治政府對其文明開化主義的文教政策進行了修改。1881 年，設立了「哲學科」，其中有「印度及支那哲學」的科目，主講教授是中村正直（1832 年-1891 年）和島田重禮（1838 年—1898 年）等。次年 1882 年「印度及支那哲學」科目改為「東洋哲學」，主講是井上哲次郎副教授（1855 年—1944 年）。可以確認，近代式的中國思想研究由此發端。1886 年，隨著「帝國大學令」的頒布，法政學部和文學部分別成為法科大學和文科大學，並得到了新的調整和充實，尤其是「漢文學科」、「哲學科」、「和文學科」和「博言學科」逐漸開始得到了重視。1889 年，東大在增設「國史學科」的同時，也開始了對「國文學科」和

⁴ 「東京大學」的名稱共計 4 次變了。1877 年叫「東京大學」，1886 年叫「帝國大學」，上面沒有地名。1897 年叫「東京帝國大學」。因為「帝國大學」除了「東京」之外還有「京都」「東北」等，所以上面需要加上「東京」的地名。1949 年回到「東京大學」了。

「漢文學科」的擴充。此後的 1893 年，導入了「講座制」⁵；1904 年文科大學設置了「支那哲學」講座。

井上哲次郎是與東京大學文學部的「和漢文學科」同時設置的「哲學及政治學科」的第一期畢業生（1880 年畢業）。他在 1881 年出版了可稱為哲學詞典前身的《哲學字彙》（西周（1829 年—1897 年）主編），今日我們所使用的「哲學」、「主觀、客觀」、「悟性、理性」等詞彙就是由此書確定下來的概念。1882 年他作為副教授開始擔當「東洋哲學」科目的主講。1884 年—1890 年的六年間在德國留學，據說先後就學於海德堡大學和萊比錫大學，聽過庫諾·費舍、威爾海姆·本德、奧德瓦爾德·策勒等的課程，似乎把黑格爾中央派和新康德主義哲學帶回了日本⁶。他還在柏林大學附屬的東方語言學校教過日語和日本文化。井上哲次郎 1890 年回國成為帝國大學的教授，1897 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校長（直到 1904 年）。1923 年退休，退休東大以後進大東文化大學，而且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名譽教授。1925 年，先後

⁵ 「講座制」不是臨時的講演制度，而是一種固定的課程。一個講座擁有一個比較寬敞的研究題目，為了進行此題目，布置有若干研究人員。一般而講，一個講座由一位教授、一位副教授和一位助教構成。

⁶ 井上哲次郎去留學的學校，海德堡大學在 19 世紀後期，是新康德學派的牙城之一。其代表學者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擔任國家科學的教授是 1897 年，1903 年離職。所以，井上和韋伯大概沒有機會互相見面。不過，毫無疑問井上受到了新康德學派的影響很大。1890 年回國以後，他對當時日本的儒學家、漢學者進行強烈批判，而且要求他們的學問具有科學性、哲學性。這種思想肯定是新康德學派的影響吧！

任大東文化大學總長、日本哲學會會長、貴族院議員等職位，1944年去世。這期間，他一直是日本哲學界影響力最大的人，為移植德國唯心論哲學，立下了汗馬功勞。

井上哲次郎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站在哲學的立場上整理和建構日本的思想資料。他出版了三部著作：《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1900年）、《日本古學派之哲學》（1902年）、《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1905年）。在這些著作的影響下，明治三十年代（1897年左右）以後，用西方哲學、尤其是德國哲學的框架分析中國思想的研究逐漸多了起來（即第二時期）。井上哲次郎自身也在1891年—1892年間的《哲學會雜誌》上，圍繞對「朱熹哲學」的解釋，與採取護教主義立場的內田周平展開了持續的爭論⁷。總之，第一時期的「哲學」，有著促進舊的中國思想研究向著近代化或西歐化轉變的意義。

例如，小柳司氣太（1870年—1940年）的《宋學概論》（1894年），就是利用西方哲學的範疇「純粹哲學、自然哲學、心理學、倫理學」來分析和解釋朱子學，這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外，也有人反對把「哲學」這個術語，以及把「哲學」的視角，外在地強加到中國思想中，這就是京都支那學派，其中狩野直喜（1868年—1947年）的《中國哲學史》（1953年）、本田成之

⁷ 內田周平是一位大東文化大學的教授。最近，我學生曹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對內田周平的重新認識」（《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3卷第2卷，2016年），為內田雪了冤。

(1882 年—1945 年)的《支那近世哲學史話》(1947 年)都可以看作是「哲學」的一種體現，屬於移植時期健康的「哲學」。

三、儒學、漢學的畸形復活與「支那哲學」

到了第二時期，明治政府開始扭曲地、畸形地復活了舊有的儒學、漢學，以作為一種策略，來對付從文明開化主義和西歐化政策中產生的過激主義的自由民權運動。可以把這個時期稱為「支那哲學」或「東洋哲學」的時期，這個時期最早開始於 1879 年元田永孚(1818 年—1891 年)⁸手定的《教學大旨》，進入高潮是 1890 年《教育敕語》頒發之後，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戰敗為止(1945 年)。

《教學大旨》把由明治政府文明開化主義和西歐化政策引發的弊病看作是道德、風俗的敗壞，認為要想矯正這些弊端，除了「基於祖宗訓典」、尊崇仁義、忠孝等孔子道德之外，別無他途。這就是後來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等倡導的、日本存在著特殊「孔子教」之說法的思想先驅。元田永孚還在 1881 年接受明治天皇的敕諭，編纂《幼學綱要》，主張必須把建基於日本的純粹的儒教道德教育當作青少年教育的指針。尤有甚者，1886 年明治天皇視察帝國大學(即以後的東京大學)時寫下的感想《聖諭記》，又由元田永孚整理成書。在這本書中，他要求培養高等人才的大學裡的修身

⁸ 元田永孚原來是明治天皇的侍讀，後來成為了侍講。

課程，也必須以儒教道德為根本。

如上所述，井上哲次郎在德國留學六年後回國，正值《教育敕語》頒發的 1890 年。明治政府聘請這位掌握近代西歐最新哲學後歸國的井上哲次郎注解《教育敕語》。他帶著對光榮使命充滿感激的心情執筆寫作，其結果就是翌年 1891 年出版的《敕語衍義》。《敕語衍義》把「孝悌忠信」和「共同愛國」作為《教育敕語》的兩個中心思想。認為「孝」不僅屬於單個家族的道德，而且也是以天皇為宗的大家族的道德。把「孝」與「忠」連接起來，強調「忠孝一致」。同時，井上哲次郎又主張，只有這樣的家族國家才是日本「國體」的精華，這個國體基於萬世一系的傳承，神聖不可侵犯。對於中國儒家經典所認可的湯武放伐那樣的「易姓革命」，他是明確地否定的，但仍須以儒教的理論為根據進行說明。

毋庸贅述，儒教的「忠」原來是一個自省概念，未必約束君臣關係；即使是約束君臣關係的觀念，亦未必與「孝」一致。認可「易姓革命」的思想，在《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公羊傳》、《孟子》等等著作中隨處可見，所以，強調「忠孝一致」，否認「易姓革命」的井上哲次郎的儒教，在中國及其以外的任何國家都沒有，是日本特殊的儒教，是明治政府為了應對從文明開化主義和西歐化政策中產生的自由民權運動等現象的對策，是以扭曲的畸形的方式復活了儒教，如果這樣去思考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他們就是把這樣的儒教作為「支那哲學」、「東洋哲學」來研究的。以上動向，以 1911 年辛亥革命和 1917 年俄羅斯革命的

爆發為契機，越發得到強化，這正是「支那哲學」和「東洋哲學」研究的悲劇。

服部宇之吉（1867年－1939年）於1883年進入東京大學預備門，1887年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1890年畢業。1898年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⁹教授、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副教授，1899年－1902年赴清國和德國留學。1902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同年應清國政府的邀請，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¹⁰速成師範館總教習。1909年歸國主講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支那哲學講座。此後的十八年，歷任主任教授，1924年－1926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部長，1926年－1927年京城帝國大學¹¹總長（在朝鮮），1928年退休，任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此後歷任國學院大學校長（1929年－1933年）、東方文化學院研究所所長（在東京，1929年－1939年）。他的著作有1917年的《孔子及孔子教》和1929年的《孔子教大義》。他把包括孟子在內的孟子以後的中國儒教與孔子相區別，給予了較低的評價，而單獨把孔子抽出來，認為儒教的真髓是孔子教（即君臣大義類的普遍真理），孔子教自古以來就在日本得到了保存和普及。這是一本捏造所謂孔子教的書，其主要目的就是使在元田永孚和井上哲次郎那裡萌芽的東西開花結果。

⁹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是現在的筑波大學的前身。

¹⁰ 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之一。

¹¹ 「京城帝國大學」是現在的首爾大學的前身。

宇野哲人（1875 年—1972 年）1897 年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學習，1903 年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1905 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副教授，1906 年—1910 年赴清國、德國留學，據說曾經參加過文德爾班的哲學史研究課程。1919 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1931 年—1935 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部長，1936 年退休，成為名譽教授。此後於 1945 年任東方文化學院院長，1949 年任實踐女子大學校長，1965 年任東方學會會長。宇野哲人也寫了一本叫《孔子教》（1911 年）的書，此外的重要著作有《儒教史（上）》（1924 年）。他在《儒教史（上）》中認為，當時的思想界處於舊道德淪喪而新道德尚未建立起來的階段。就新道德的建設而言，神道、儒教、佛教，尤其是儒教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儒教雖然發生於中國，但孔子的真義（即重視大義名分的思想），傳到日本後才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他強調孔子教和孔子以後的儒教（認可易姓革命的思想）是不一樣的。

四、作為學術研究的「支那哲學」

第三時期開始於明治三十年代（1897 年左右）前後。那時，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或者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學習剛剛移植過來的「哲學」的學生們畢了業，就職於各個研究機關，並開始運用「哲學」對中國思想、東洋思想進行學術性質的研究。這個時期，隨著「哲學」的影響不斷地向廣度和深度進展，對「哲學」的理解也不斷得

到擴展和加深，其結果是，學者不再像第一時期、第二時期那樣，服從日本政府的政策要求，主觀地處理中國思想，而是就中國思想的實際，進行客觀的學術性質的研究，當然，研究仍然是在「哲學」的框架內進行的。這個時期的終結可以放在太平洋戰爭戰敗之時（1945年）。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哲學科中設置「支那哲學」講座，是1904年，這距「哲學」移植進來，已有三十年了。在這期間，「哲學」對中國思想研究具有相當深廣的影響，同時，從事中國思想研究的學者們對於「哲學」的理解，在廣度和深度上也有相當大的提高。

的確，當初哲學科的畢業生們的研究，有不少是將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作單純的、圖式化的對比。他們急於從西方哲學中找出一些方法，運用到對中國思想的分析和整理中來，自然沒有餘力對中國思想進行文獻學的、文本學的探討，無法對思想內容進行深刻的玩味，不能將研究方法加以具體化並做出深刻的思考。但是，明治三十年代（1897年左右）以後的「支那哲學」、「東洋哲學」中的「哲學」，顯然就是近代西歐的「philosophy」，所以，他們的視野並不限於明治政府統治之下的日本，所從事的也不僅僅是服從日本政府的主觀性很強的中國思想研究，可以肯定，他們的目的就是針對對象的實際進行客觀的、具有學術性質的研究。

1885年從東京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的井上圓了（1858年—1919年），在1887年創立了哲學館（1906年改稱為東洋大學），

東京專門學校（1902年改稱為早稻田大學）則設立於此前的1882年。以這些地方為據點，一批新銳的哲學研究者，如松本文三郎、遠藤隆吉、桑木嚴翼¹²等人，與依據儒學、漢學的舊有研究和從屬於明治政府政策要求的「孔子教」研究相比，可以說他們的研究指向更加客觀的、具有學術性質的「支那哲學」、「東洋哲學」。他們的主張，主要發表在井上圓了主編的《東洋哲學》（1894年創刊）雜誌上。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們所設想的是建立一個能夠與西方哲學並肩的新的「支那哲學」、「東洋哲學」的研究方法和組織體系。當然，這一體系的模本，仍是西方哲學和西方哲學史。

松本文三郎（1869年—1944年）是以研究印度哲學和中國佛教著稱的學者。1893年從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畢業後，有著活躍的學術活動，先後在東京專門學校、哲學館、聖保羅學校（後來的立教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等任教。1906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設立委員，後來成為該校的教授，主講印度哲學講座。1908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長（直到1915年），1929年退休，成為名譽教授，此後在1938年任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直到1944年）。松本文三郎在1903年後，出版了多本關於印度哲學和

¹² 桑木嚴翼是1874年出生，1946年去世。1896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畢業，1906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1914年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35年退休。主著是《哲學概論》，專門研究康德哲學。他還對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也很感興趣，出版了關於荀子和墨子邏輯思想的論文。

中國佛教的研究著作。在那之前有 1893 年的《叔本華氏國家哲學》、1896 年的《叔本華哲學提要》、1897 年的《心理學》和《哲學概論》、1897 年—1898 年的《認識論提要》、1898 年的《支那哲學史》、1903 年的《倫理學》等。他是日本第一個介紹叔本華哲學的人。¹³

1898 年的《支那哲學史》，是東京專門學校的講義記錄。這本著作努力確立純粹的學術性研究，完全感覺不到借助「支那哲學」的名義恢復儒學、漢學或者儒家道德的氣息。其內容是以本體論（宇宙論）和認識論為中心來說明各思想家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他通過與西方哲學的比較，指出支那哲學的最大問題在於「缺乏邏輯性的思想」。

遠藤隆吉（1874 年—1946 年）是日本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1899 年從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畢業，先後任高等師範學校、日本大學¹⁴等校講師，後來成為早稻田大學教授。1907 年他發起成立日本社會學研究所，1922 年創立了巢鴨高等商業學校（現在的千葉商科大学），此後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著作有 1900 年的《基廷社會學》和《支那哲學史》、1901 年的《現今之社會學》、1903 年的《支那思想發達史》、1904 年的《日本社會之發

¹³ 叔本華，在主著《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寫過了「我是個信奉佛教的人」，從這一點來看，松本一方面研究印度和中國佛教，同時研究叔本華哲學，也並不意外。

¹⁴ 「日本大學」是一座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

展及其思想變遷》、1905 年的《國家論》、1907 年的《近世社會學》和《社會學講解》、1909 年的《東洋倫理學》、1911 年的《漢學之革命》、1916 年的《社會力——附朝鮮社會發展的由來》和《易之原理及古筮》、以及 1923 年的《社會學原論》等。

上述著作中，1900 年出版的《支那哲學史》是一本仿照西方哲學史，著力於敘述「思想淵源及其發展」的書。該書對與孔子言行有關的六經的可信度表示懷疑，並指出《墨子》、《韓非子》有許多地方不是本人所寫。他對中國古典持明確的懷疑性的文獻批判態度。至於對孔子的評價，他也反對漢學者們把孔子當作超時空的聖人來崇拜。此外，1903 年出版的《支那思想發達史》，是一本從社會狀況和思想的關係角度出發闡述中國思想發展的著作。其第一編「支那社會的形成」，對中國原始時代以後的社會狀況，如從婚姻、氏到姓、宗教、政治等發展過程做了描述。此外，1909 年出版的《東洋倫理學》中，他力圖利用自己的西方倫理學的知識，確立「東洋倫理學」獨特的倫理學體系。

五、代替「支那哲學」的框架探索

第四時期從太平洋戰爭失敗（1945 年）直到 1993 年或 1994 年。這個時期，雖然研究者們和以往一樣，仍使用著「哲學」這個術語進行研究，但好像已經逐漸淡忘了「philosophy」這個術語原來是從西歐輸入的。換言之，已經到了必須尋找一種新的東西代替

「哲學」的研究方法和組織體系，來研究中國思想的時候了。但是，可以代替的有效的研究框架尚未形成，所以暫時還只能使用過去的「哲學」進行研究。

日本戰敗所帶來的是，上述第二時期盛行的、打著「支那哲學」「東洋哲學」旗號以畸形地復活舊有的儒學和漢學的活動不再受到歡迎。¹⁵毫無疑問，這意味著舊有的儒學和漢學研究的衰落。同時還表明，不僅「支那哲學」「東洋哲學」衰落了，明治維新（1868年）以後在推動此類研究中一直扮演主角的東京大學的中國思想研究也衰落了。

隨著戰後的思想解放，中國思想研究中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主義。如通過比較研究，極其宏觀地把握中國思維方法的中村元的《東洋人的思維方法》（1947年）以及《比較思想論》（1960年）；在西歐近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刺激下產生的島田虔次的《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1949年）和《朱子學和陽明學》（1967年）；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仁井田陞建基於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的《中國的法思想史》（1950年）和《中國社會的法與倫理》（1954年）；被讓·保羅·薩特和卡爾·雅斯貝爾斯存在主義深深吸引的福永光司的《莊子——中國古代的存在主義》（1964年）；受到伴隨新中國建設而傳入日

¹⁵ 戰敗後，日本一般的知識分子不喜歡儒學、漢學了。主要原因在以上的歷史和經緯。

本的馬克思主義影響¹⁶的重澤俊郎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抗爭史》（1964年）和《活在中國歷史中的思想》（1973年），都可以視為這個時期的代表作。

以上各種主義的出現可以說是多種嘗試，研究者們認為「支那哲學」、「東洋哲學」的「哲學」，作為一種視角，對於掌握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思想的實質而言，是不充分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感到有必要探索有效的替代性研究框架。給這些嘗試以極大啟發者，應該說是1907年以京都大學為中心創立、此後得到不斷發展的所謂「京都支那學」。這個學派於1907年創立支那學會，1920年創設京都支那學社，之後在狩野直喜（1868年—1947年）和內藤湖南（1866年—1934年）兩人的領導下，歷經小島祐馬（1881年—1966年）、本田成之（1882年—1945年）、武內義雄（1886年—1966年）、青木正兒（1887年—1964年）等學者，影

¹⁶ 不用說，日本戰前戰後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很多很大。不過，那時一冊都沒有使用唯物—唯心的公式，來解釋整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書。這一公式，一般認為1947年蘇聯的理論家 Zhdanov 來到中國，他到中國各地作講演時大肆宣傳，因此盛行的方法論。但是，使用這一公式來解釋整個中國哲學史的，是更早國際共產的理論家叫 August Thalheimer（1884年—1948年），來自德國，在 Moskva 的孫中山大學裡1927年5月5日到23日作過連續講演。聽眾主要是中國人，可能有日本人也聽講了吧。翌年1928年他出版了這本書，書題叫《Die Moderne Weltanschauung》。以後，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叫《現代世界觀》，譯者是武漢大學首代校長的李達。日本也有一本翻譯書。不過，這本書影響力並不強烈。重澤俊郎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這本是利用唯物—唯心的公式，來解釋整個中國哲學史的，唯一研究書。

響不斷擴大。京都支那學並不服從當時政府的政策要求，而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討厭舊有儒學、漢學的非近代的非學術的曖昧性，對「支那哲學」、「東洋哲學」片面性中包含的危險持批判態度，針對文史哲不分家、相互之間存在有機關聯的中國文化的特徵，他們力圖確立一種綜合性的、尤其是進入中國思想內部的研究方法。

戰後東京大學中國思想研究的學制，從 1948 年到 1993 年，文學部的專修課程以及研究室稱為「中國哲學」，從 1953 年到 1994 年，新制大學院（研究生院）人文科學研究科的專業課程名稱也是「中國哲學」。另外，從講座來看，1919 年的「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第一、第二、第三講座，一直持續到 1962 年。1963 年改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第一、第二、第三講座。1964 年—1993 年之間，「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第一和第三講座的內容是「中國哲學」。所以，雖說在學制上，基本上仍然使用「中國哲學」這個術語和「中國哲學」這個角度。但是，「中國哲學」這個術語已經無法對接 1860 年代從西歐所輸入的「philosophy」的意義了。當然，也不存在那個所謂的「支那哲學」、「東洋哲學」的意義了。雖然已經知道有必要建立一種新的有效的研究框架，以取代「哲學」的研究方法和體系，但這個框架至此尚未出現，所以這裡暫時還只能使用「哲學」這個術語。

戰後，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由主任教授負責，集中了全部教員和畢業生的力量所編輯的一些研究著作，名稱大多都是

「中國思想」，這一事實也說明了上述情況。著作計有以下數種：加藤常賢監修的《中國思想史》（1952年）；宇野哲人博士米壽記念論文集《中國的思想家 上、下》（1963年）；宇野精一、中村元、玉城康四郎主編的《講座東洋思想》全十卷（1967年），其中三卷是《中國思想》第一、第二、第三；大修館書店出版的《中國文化叢書》全十卷，內中第2卷是赤塚忠、金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涌編寫的《思想概論》（1968年），第3卷是赤塚忠、金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涌編寫的《思想史》（1967年）；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編寫的《氣的思想——中國的自然觀和人間觀的展開》（1978年）等。

六、新的嘗試——「東亞思想文化」、「中國思想文化學」

最後，我來談談筆者所屬東京大學在最新時代展開的中國思想研究「新的嘗試」。1994年、1995年學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說標誌著上述第四時期的結束和第五時期的到來。

1994年，東京大學文學部進行了很重要的學制改革。這次改革，又為第二年做的更大規模的改革奠定了基礎。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講座制從由來已久的小講座制改變成為大講座制。在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化研究、教育的各個講座，如上所述，1919

年的「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第一、第二、第三講座，一直持續到 1962 年，1963 年改稱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第一、第二、第三講座，1964 年，又增設了「中國言語文化」講座，此後直到 1993 年，「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第一和第三講座的內容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第二講座和「中國言語文化」講座的內容是「中國文學」。這次的改革是把上述的第一和第三講座再編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大講座，把上述的第二講座和「中國言語文化」講座再編為「中國文學」大講座。此外，「東洋史學」¹⁷ 的四個講座也再編為一個「東洋史學」大講座。

第二、專修課程和研究室的名稱由「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隨著這次改革，「印度哲學」也改為「インド哲學佛教學」¹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印度語印度文學」改為「インド語インド文學」，「俄羅斯語俄羅斯文學」改為「斯拉夫語斯拉夫文學」，「意大利語意大利文學」改為「南歐語南歐文學」，「國語學」和「國文學」則改為一個名稱「日本語日本文學」。

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這一事實所包含的願望是，代替上述第一、第二、第三時期的「哲學」中的種種偏頗，特別是把本來與中國無關的近代西歐「哲學」帶進中國的外在的研究方法，尋求第四時期已經開始探索的，能夠捕捉中國思想實際內

¹⁷ 「東洋史學」主要指的中國歷史學。

¹⁸ 即不再使用漢字「印度」，而直接使用片假名。

在性的研究框架。需要補充的是，「中國思想文化學」所設想的範圍，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擴展，它當然不排除前述的「哲學」，而以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為主幹，此外也包括道教、佛教之類的宗教和禮制，民俗、天文、歷法、數學、醫學、藥學等科學、技術，以及音樂、繪畫、藝術等。只有這樣，才能接近中國思想的實際。

此後，1995年，東京大學文學部以大學院（研究生院）為中心，又進一步實行了更大規模的改革，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大學院的人文科學研究科和社會學研究科合併成為一個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使大學院成為大學布局的重點。基本講座由文學部擔當，協力講座由東洋文化研究所、史料編纂所、社會情報研究所共同參與。由此，文學部轉變為以培養學者為中心的大學院（研究生院）。

第二、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再編為「基礎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亞細亞文化研究」、「歐美系文化研究」、「社會文化研究」五個專業，以下再分為十八個 course（課程），二十七個專門分野。這裡雖然大幅度採用了地域研究的思路，但還不止如此，這些設置都以推進各個不同 course（課程）和專門分野的多學科交流為前提。

第三、「亞細亞文化研究」專攻之下又分設了「東亞細亞」、「南亞細亞、東南亞細亞、佛教」、「西亞細亞、伊斯蘭學」三個 course（課程），「東亞細亞」課程之下又設了「中國語中國文學」、「東亞細亞歷史社會」、「東亞細亞思想文化」三個專門分

野。1948 年以來，大學院（研究生院）一直延續的「中國哲學」專業，在這次改革中，被改為「東亞細亞思想文化」，與「中國語中國文學」（沒有變動）、「東洋史學」（的中國史學部分）一起被編入「東亞細亞」課程。無疑，「東亞細亞思想文化」要追求的是，與中國文學、東洋史學相互補充，吸收後者的研究成果，構築起「中國思想文化學」的框架。同時，把與日本思想和朝鮮思想的異同比較研究納入視野，使「中國思想文化」得以徹底客觀化、學術對象化。

第四、1963 年以來文學部設置的「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言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1979 年改為「第四類行動學」）四類，改為「思想文化學科」、「歷史文化學科」、「言語文化學科」、「行動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當然屬於「思想文化學科」。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文化」這個術語及其視角，已經得到了文學部公認。

七、餘言

以上簡略概述的東京大學文學部最新的學制改革，從今天（2019 年）來看已經是約二十年前的改革，這一制度後來確立並安定下來。作為代表這個時期的主要著作，有溝口雄三、丸山松幸、池田知久編寫的《中國思想文化事典》（2001 年，東京大學出版會）；溝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島毅編寫的《中國思想史》

（2007年，東京大學出版會）等。但是，這些改革實際上目前還只是停留在學制改革階段，尚不能自信滿滿地稱其為中國思想研究內容上的新展開。此次改革所產生的「東亞細亞思想文化」、「中國思想文化學」的新葫蘆裡，將來究竟能裝進怎樣的美酒？對於在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文學部執教以及學習中國思想的人們來說，還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如果我們以上述近代日本中國哲學研究的歷史為基礎，對具有新內容的中國思想研究所向往的方向和大局做出描述，就會發現其中必然包含著以下兩種相互對立的要素。

第一要素如同明治維新（1868年）以來移植時期健康的「哲學」（參見本文第二部分《明治維新政府對「哲學」的移植》），需要我們在今天更深更廣地擁有一顆新的心靈，在此基礎上把我們的研究向著世界加以開放。不能把包含臺灣、中國、日本、韓國的亞洲思想研究，僅僅封閉在自己國家的內部以及亞洲的內部並希求舊文化的復興。例如有必要積極攝入歐美等其他地區的文化，並積極推動其他地區的文化。當然，不用說，像上面講到的明治日本那樣，僅僅以歐洲的「哲學」為唯一的模範加以尊崇的姿態，在今天需要全面地加以糾正。不過，筆者認為，亞洲思想的研究者要關心歐美哲學並加以學習、研究，這自不待言，同時更要為世界提出新的方案和思想，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第二要素和上述第一要素正相對立，是潛藏在中國思想（甚至可以說是亞洲思想）內部的一種方向。基於對上述日本中國哲學研

究史的反省，很多有良心的學者都感覺到在研究中國思想時，「哲學」這一詞彙、觀點下作出的研究，有不充分、不周到的地方，為了利用這一教訓，第二要素就具有了必要性、是不可缺少的（參見本文第五部分「代替「支那哲學」的框架探索」）。這種研究要求深入到中國思想、亞洲思想內部深處，從中找出問題，並沿著中國思想、亞洲思想固有的思想體系去闡明這些問題，在此基礎上得出生活於當代臺灣、當代中國、當代日本、當代亞洲的我們都能接受的結論。

要使上述兩種要素得以同時成立，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課題，至今為止在這個課題上取得成功者或許不多。然而，為甚麼這兩者的同時成立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欠缺的，這是因為中國思想、亞洲思想研究本來是一種極為高級的智力活動。

參考文獻（只是日文的著作）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1932年，東京帝國大學）

《東京大學百年史》（1987年，東京大學）

戶川芳郎〈明治初期の大學制度といわゆる「漢學」——近代アカデミズムの成立と中國研究（序章）〉（1965年，《日本近代化とその國際的環境》，日本近代文化研究會）

戶川芳郎〈漢學シナ學の沿革とその問題點——近代アカデミズムの成立と中國研究の「系譜」（二）〉（1966年，《理想》

397, 理想社)

坂出祥伸〈明治哲學における中國古代論理學の理解——桑木嚴翼を中心として——〉(1966年, 船山信一《明治論理學史研究》, 理想社)

赤塚忠〈思想概論・序論〉(1968年, 《中國文化叢書》2, 大修館書店)

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研究史——明治から昭和のはじめまで 前野直彬氏と共に——〉(1969年, 《吉川幸次郎全集》17, 築摩書房)

町田三郎〈道家思想研究史のための覺書——武内・津田兩博士の業績を中心にして——〉(1972年, 東北大學教養部《東北大學教養部紀要》15)

吉川幸次郎《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1976年, 講談社)

坂出祥伸〈我國に於ける中國哲學研究の回顧と展望——通史を中心として——(上、下)〉(1977年, 關西大學《文學論集》26—1、2)

倉石武四郎〈日本中國學會はどうしてできたか〉(1981年, 《倉石武四郎著作集》1, くろしお出版)

町田三郎〈天囚西村時彦覺書〉(1983年, 九州大學文學部《九州大學哲學年報》42)

町田三郎〈岡松甕谷のこと〉(1987年, 九州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九州大學中國哲學論集》13)

- 町田三郎〈明治以降における道家思想研究史〉（1988 年，九州大學文學部《九州大學哲學年報》47）
- 福井康順〈東洋哲學斷想〉（1988 年，《福井康順著作集》6，法藏館）
- 町田三郎〈遠藤隆吉覺書〉（1990 年，九州大學文學部《九州大學哲學年報》49）
- 町田三郎〈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の人々〉（1992 年，九州大學文學部《九州大學哲學年報》51）
- 江上波夫《東洋學の系譜》（1992 年，大修館書店）
- 伊東貴之〈「挫折」論の克服と「近代」への問い——戦後日本の中國思想史研究と溝口雄三氏の位置〉（1993 年，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會《中國哲學研究》5）
- 坂出祥伸《東西シノロジー事情》（1994 年，東方書店）
- 江上波夫《東洋學の系譜 2》（1994 年，大修館書店）
- 町田三郎〈明治漢學覺書〉（1995 年，町田三郎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町田三郎教授退官記念中國思想史論叢》上）
- 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學者たち》（1998，研文出版）
- 池田知久〈日本中國學會五十年小史〉（1998 年，日本中國學會《日本中國學會五十年史》）
- 戶川芳郎〈帝國大學漢學科〉（1998 年，日本中國學會《日本中國學會五十年記念論文集》）
- 池田知久〈東京大學的中國哲學的研究及其新開展〉（中國文，

2000 年，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哲學卷》)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學」の形成と構圖〉(2006 年，《「帝國」日本の學知》3，〈東洋學の磁場〉，岩波書店)

(1998 年 5 月初稿，2019 年 8 月增補、改訂)

(修訂、補充和潤色：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曹峰)

2019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 場次表

主講人：池田知久教授

《老子》的哲學——形而上學、存在論以及萬物生成論

時間：2019年10月16日（三）

性三品說的形成與展開——圍繞人本性的平等和不平等

時間：2019年10月18日（五）

近代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

時間：2019年10月21日（一）